

# 由农本而重商

## ——封建社会的深刻经济危机

薛 国 中

西方学者就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进程,展开过关于封建社会经济危机的讨论,中国少数学者也就中国历史提出了对封建经济危机的见解。封建经济危机问题之所以广泛地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注意,是因为它关系到由封建社会经济形式如何向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转变,正如英国学者R·H·希尔顿所说:“所谓危机就是社会机体和自然机体的历史的转折点”<sup>①</sup>。大家知道,“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sup>②</sup>。否定不是突然发生的,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到来之前,会出现社会变革浪潮的前锋,封建经济危机就是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浪潮前锋”<sup>③</sup>。本文试图就中国14世纪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考察封建经济危机在中国发生的具体情况。

“经济危机”的概念,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而产生的,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形成了商品生产过剩,找不到需求,产销失去平衡,对社会再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质,而且发展趋势是日益频繁,周期性短,一次比一次深刻。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的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的矛盾所引起的不治之症,最终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应当适用于对封建经济危机的分析。

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在中国学术界最早提出了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观点。该书按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接着说:“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里,由于战争、灾荒或瘟疫等原因,也曾使社会经济陷入极大的恐慌和混乱,出现过经济危机。但那是一种生产严重不足的危机,而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二者是根本不同的。”<sup>④</sup>这里所谓的“根本不同”,只是危机表现的不同。《辞典》没有分析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产生经济危机的社会基本矛盾,更没有指出危机对社会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显然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胡如雷同志近年在所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提出的封建经济危机的看法。他也认为生产不足是封建经济危机的表现,但他从社会基本矛盾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源。他说:“我国封建社会的再生产也一再遇到困难和阻碍,不断爆发经济危机,这种周期性危机是生产过程的个体性与大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引起的”。又说:与西方不同,中国“因为土地能够经常买卖和转手,所以除此之外,基本经济矛盾还不断由于土地兼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大而趋向尖锐,引起经济危机一再爆发”。他最后说,封建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是一次比

一次深刻，“沿着这种趋势顺其自然地发展到我国封建社会的天然终点，就会因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极度矛盾而爆发封建制的总危机”，或者说“必然会在末期经历最后的危机”<sup>⑤</sup>。他所说的“总危机”和“最后的危机”，都是指封建制度存亡继绝的危机。由封建经济危机衍生的政治危机，就是农民起义和封建王朝的覆灭。

胡如雷的上述看法，是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学说，结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展开论述的。他结合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化的规律，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结局，籍以透射出新的历史转折的熹微晨光，给人以启发。但是他完全忽略了他所说的封建社会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之间有着根本区别。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先进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和产品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其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最后，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或其他方式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产品先按劳分配后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制度，为先进生产力的继续发展除去障碍。这里，先进的生产力（现代化的大生产）和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是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根本条件和动力，舍此无他。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以及由之衍生的政治危机却不是这样。按照胡如雷的观点和分析，中国封建经济危机是生产过程的个体性与大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引起的”。所谓“生产过程个体性”，无疑是指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规模狭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包括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并不是当时社会的先进经济组织形式，相反，“按其本性来说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sup>⑥</sup>，是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代表这种经济形式的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是保守阶级，“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sup>⑦</sup>。农民因其守旧，提不出任何比封建制度进步的社会制度。他们也有过“空想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sup>⑧</sup>。他们作为一个阶级，不可能使自己处身其中的封建社会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

土地、赋税、力役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根本的经济问题，农民、地主、王朝三方面为此展开激烈的斗争。与西方中世纪的封建诸国不同，中国封建王朝是建立在所控制的广大自耕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它从这个基础取得庞大国家机器（庞大的官僚体系、庞大的军队和特务机构）所需的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因此，历代王朝建立后，总是用分配土地给农民的经济政策（明王朝叫“计口授田”）和抑制兼并的政治措施，保持自耕农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同时日益加重对自耕农民的赋役压榨，以满足其不断增加的财政需求。王朝赋役对农民压榨之重，往往不亚于地主对佃农、雇农的剥削，终又迫使他们抛荒逃亡，破坏了王朝初建时所维护的基础。宋代范镇说得很清楚：“人民流离，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能宽其力役，轻其租赋，虽大熟使民不得终岁饱，重敛在前故也”<sup>⑨</sup>。人民连最低的生活要求都得不到，再生产如何进行，社会经济如何不陷于萧条、残破？与此同时，地主豪绅乘机加紧土地兼并，与王朝争夺土地和劳动力。农民，主要是自耕农，在全部封建势力压迫下，终于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演出一幕幕悲壮的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仅次数多，规模大，活动范围广，为世界历史所仅见，而且最大的特点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政权。因此，中国农民起义最大的积极意义是推翻旧的王朝，迫使新王朝再度分配土地或承认他们在起义中各自夺得的一小块土地，减轻赋役，使生产得以继续和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粉碎成小块，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sup>⑩</sup>。所以，“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

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sup>⑪</sup>。但复兴也只是暂时的，若干年月之后，赋役又日益加重，土地兼并又日益激烈，农民抛荒逃亡和武装起义的剧本又再次拉开，如此反复进行。于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呈现出这样的景况：土地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权是走马灯式的更迭。这就是胡如雷所说的封建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然而，尽管这样的周期性危机反复了许多次，一个王朝在危机中灭亡，另一个王朝在危机中崛起，中国的封建制度却依然如故。中国周围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所以马克思说：“亚洲各个国家不断重建，王朝也不断变更，但与此显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在政治风云的浪潮中，总是原样不动”<sup>⑫</sup>。或者说：“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sup>⑬</sup>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并未沿着胡如雷所说的那种趋势，顺其自然地发展到它的终点。尽管宋、明、清三代的农民起义在每一阶段都始终不断，与各个王朝相始终”<sup>⑭</sup>，但封建王朝的相继灭亡，并不就是封建制度总危机到来，更不是封建制度全面崩溃和结束。总之，胡如雷关于封建经济危机的论述，终究未能说明中国封建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未揭示出社会变革的途径和动力。其根本弱点是完全忽视小农经济的落后性，过高地估计农民和农民战争的作用。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有句名言：“消灭封建制度，如果用肯定的形式来表示，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sup>⑮</sup>这是农民自身所绝对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 二

由封建主义经济形态向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过渡，是两种绝然不同的经济形态的更迭。封建经济形式是以农业为本，世界上一切封建经济形态原则上都是如此。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从秦汉直到明清，无不强调“农为国本”，“农桑王政之本”。他们所谓的“农”，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规模狭小的农业，其技术，落后守旧，不求进取；其组织，男耕女织，农副结合；其目的，上纳租税，下养家口，自给自足。他们把工商业视为“末业”，作为农本的附属和补充。在这样的经济形式中，人们按等级和职业分别开来，“各安其生”，特别要求农民“尽力畝亩”，“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sup>⑯</sup>，把全国绝大部分的人口固着在狭小范围之内。这种封闭的经济形式，限制着人们天赋才能的发挥，阻碍着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不破坏它，整个社会经济要得到长足发展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是以工商业为本，把农业也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要求打破封闭隔离的格局，把社会经济各部门通过市场联系起来。它是在竞争中求发展，因而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实行专业分工，扩大生产规模，开拓新的领域，生产出日益增多的财富。但这并不是久已有之的现成经济形式，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产生和发展。因此，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必须有这样一种力量，它负有双重历史使命，一方面破坏旧的经济形式，一方面孕育和助长新的经济形式。这个力量就是也只能是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商品生产与流通）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才出现的，它在相当长时期处于封建农本经济的从属地位，主要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为他们所控制，市场狭小，但本质上与农本经济是对立的。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潜在的对立日益成为尖锐的对抗，冲击着封建制度各个方面，首先冲击故步自封的农本经济。同时，在商品经济发展中，逐渐孕育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母体中产生的，商品经济就是这母体中的胎盘。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西欧封建社会后期一些

国家实行“重商”政策，就起着这破旧立新的历史作用。显然，由农本而重商，是商品经济与农本自然经济的冲突，是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基本经济矛盾最尖锐的表现（商品经济是生产力的社会表现），是新旧社会经济形式生死斗争的前奏，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必经的途径。由农本而重商这一转折形成的经济动荡，是封建社会最深刻的经济危机。世界近代的历史就是这样开端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重视商品经济破旧立新的伟大历史功能。他们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在它们的不同形式上主要面向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发生着解体的作用。”<sup>①</sup>它一步一步地使生产依从交换价值；它一步一步地把直接的使用价值推到幕后，因为它使生活依靠出卖多于依靠产品底直接利用。瓦解旧有的社会关系，因而促进货币流通。它最初只触及生产底剩余，以后逐渐把握到生产本身。”<sup>②</sup>“骑士的城堡在被新式炮火轰开以前很久，就已经被货币破坏了”。“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sup>③</sup>“商业原来也是行会工业、农村家庭工业和封建农业得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前提。”<sup>④</sup>总之，“它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最早变革时期，即近代生产的发生时期，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sup>⑤</sup>马、恩的这些话虽是就西欧历史发展而作出的论断，但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完全适用于中国。

直到16世纪，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这是许多西方学者也肯定的事实。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在《1500年以来的世界》一书中说，欧洲一直拿不出能在亚洲市场出售的商品，只能用贵金属来支付，“到16、17、及18世纪还是如此”<sup>⑥</sup>。这里所说亚洲市场出售的商品，主要是中国商品。另一位美国学者卜德也说：“二千多年来，……中国向西方世界提供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欧洲和美洲向中国提供的东西”<sup>⑦</sup>。还有英国、墨西哥及菲律宾等国学者也都撰文肯定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对外贸易的繁盛正是国内商品经济发达的反映。的确，15世纪以后中国的商品经济有相当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商品范围扩大，进入市场的不仅有供应统治阶级的奢侈品，更多的是一般人民日常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仅据1451年北京附近大兴、宛平两县统计，征税商品有270余种，都是农业和手工业一般产物<sup>⑧</sup>。这与该两县靠近首都有关，江南经济繁荣地区亦当如是。商业资本大为发展，“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sup>⑨</sup>，并非都是与政府勾结以牟盐茶之利，而是大批伸入到各个经济领域，伸入到市镇乡村，将工农产品运贩各地。16世纪初叶，一个苏州布商贩运到辽阳的棉布，一次数达三万匹<sup>⑩</sup>。新的工商市镇星罗棋布，有的乡镇，如苏州盛泽镇、嘉兴濮院镇，贸易额年达万金，数十万金<sup>⑪</sup>。不少手工业者在商品生产中资金积累日多，设备日增，生产规模日大，成为雇佣工匠的工场主，浙江仁和张瀚一家就是其中之一<sup>⑫</sup>。海外贸易虽遭封建王朝严禁，但仍以走私方式继续发展，与日本、琉球、南洋和西欧商人的交易未断。丝调、瓷器及其他一般工农业产品的输出，赚回了大量白银，为国内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仅1597年与西班牙商人的贸易，输当白银达345,000公斤，相当于明王朝每年货币赋租400万两的两倍半<sup>⑬</sup>。以上这些引人注目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对封建经济起着瓦解作用并孕育出新的经济因素。关于商品经济对农本自然经济的侵蚀，我曾有专文进行过探讨<sup>⑭</sup>，勿须重复。这里只对胡如雷的有关论断提出一点商榷意见。

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提出，“不宜片面地夸大某些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认为直到明清时期，农民出卖自己的产品只是自给物品中的一部分，是“为买而卖”，不是为了生产价值，而且“仍然是封建性质的生产”，这就值得商讨了。就全国而言，当然不能说已有相当多的农民在从事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生产。但在经济发达的

江南,特别是东南沿海几省,确已有不少农民进行着商品生产,不妨略举数例:太湖周围府县农民,不少以生产商品丝、绸为业,“以蚕代耕”,投入这项生产的,不仅有妇女也有男子。长江三角洲盛产棉花,不少农民以种棉织布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嘉定县农民“种稻田不能什一”,“独托命于木棉”,棉花收后,“市中交易,未晓而集”<sup>②1</sup>,上海200多万亩土地,大半用来种植棉花<sup>②2</sup>,原棉布匹销于各地。这些不能说不以商品生产为主。有的地方完全不种粮食,专植经济作物。“出(漳州)郡南五里,有乡田塘北,居人不种五谷,种花为业,花之利视谷胜之”<sup>②3</sup>。广东、福建出产龙眼、荔枝、甘蔗,获利甚厚,不少农民毁稻田以种,其中有以此致富者<sup>②4</sup>。这些地方所需谷米由外境供应,以致因闽粤争购,粮食涨价<sup>②5</sup>。胡如雷自己也曾举出陕西固城附近“沃土腴田,尽植烟苗”,商人每年以数千万里来收购的史实<sup>②6</sup>。难道这些以种植经济作物获利,以商人为雇主的农业生产不是商品生产而仍然是“为买而卖”的“封建性质的生产”?把当时的商品经济的程度估计过高不行,一概抹煞也不是实事求是。只能说进行商品生产的农户是有的,但在全国农业中还是少数。

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统治者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等也提出挑战。早在南宋时期,叶适(1150—1223)批评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sup>②7</sup>陈亮(1143—1194)则强调农商相辅相成的关系,“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把二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sup>②8</sup>。明代张居正、张瀚等人发挥了陈亮的思想。张居正说:“商通有无,农力本穡,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商农之势若权衡然”<sup>②9</sup>。张瀚认为“善为国者,令有无相济,农末适均”<sup>③0</sup>。强调商业在整个封建农本经济中的作用,是对“重农抑商”政策的修正,而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则是对“重本抑末”政策的直接否定,当然,封建王朝不会因此改变这一传统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也还未达到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历史阶段。

总之,15世纪以后的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对旧的封建制度起着不容忽视的破坏作用,正在为新的经济形态的产生和成长创造条件。旧制度正在遭到破坏,新制度已被土萌芽,这不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而是两种经济制度此消彼长的矛盾。

面对着商品经济的挑战,封建王朝用加强对商业压制的办法来维系其农本经济的基础。他们对商业规定了种种限制,如城市工商业的军管制度,铺户审编制度,掠夺性的采办制度等等。最严重的是加重商税,“天下税课,独苦在商”<sup>③1</sup>。封建王朝征收商税的目的,除为增加财政收入外,更主要的是以此抑商。明成祖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sup>③2</sup>万历时期大臣吕坤(1536—1618)说:“征商以抑逐末之人。”<sup>③3</sup>明人宋濂等修的《元史》中也说:“商贾之有税,本以抑末”<sup>③4</sup>。君臣百年之间异口而同声。在商税的重压下,许多工商业破产,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一些士大夫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大小工商业者的利益对政府竭泽而渔的重税政策提出批评。张瀚说:“征商非盛世之政,弛十之二,商贩税趋。”<sup>③5</sup>伍袁萃则根本商税的正当性,认为“征商,前代亦有之,然实衰世苟且之政,圣王之世无闻焉”<sup>③6</sup>。至否定于一般工商群众,直接用武器的批评来代替批评的武器。据统计,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20年代,全国发生的工商业者的反抗斗争(“民变”)大小30、40起<sup>③7</sup>。其中最大的有1599年(万历27年)山西清源县王朝佐领导数万小商贩反对“中常侍马堂榷清源横征”的暴动<sup>③8</sup>。1601年苏州手工工匠葛贤领导数万人举行了驱逐税监孙隆的暴动<sup>③9</sup>。1602年苏州发生了机户反对税监刘成的斗争<sup>④0</sup>。1447年(正统12年)浙江处州庆元县叶宗留的起义,是矿主与矿工联合反对封建政府的斗争,不属于农民起义性质,叶宗留自己是个犯禁私采银矿的业主,“雇矿手二百余人,开矿大作”<sup>④1</sup>。这些斗争虽然与农民起义一样,最后失败了,但其性质与农民起义是根本不同的,是要求发展工商业,是商品经济与农本经济矛盾的阶级表现。起义者虽还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

毕竟是一支新的力量，其斗争方向体现了中国社会经济由农本而重商的要求，应予以充分重视。

### 三

中国毕竟没有象西方和日本那样，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是成为外国资本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学术界纷纷讨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提出了各种意见，大部分是从经济上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作出回答。他们的研究有不少收获，但仅此一方面是不够的，而且若强调过份，不免流为片面。恩格斯说过，“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sup>⑤</sup>，有的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另辟蹊径，扩大了探索的领域，但也还只限于分析封建专制政府对农民沉重的赋役压榨和对农业再生产的束缚，这仍显得不足。须知受封建专制政府压榨和束缚的不仅是农民和农业，还有正在发展中的工商业。“重农抑商”的要害在抑商，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正起着破旧立新的历史作用，扼制它的发展，就是扼制社会的进步。中国自16世纪后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不能不就这点来考察。

考察必须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全局中来进行。本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周围其他民族和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和联系。特别是16世纪以后，人类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历史的时代，全球海上航路大开，中国不仅与周围日本、南洋、印度等地区国家和民族关系密切，而且与远在地球西端的欧洲诸国的关系也由开始建立而逐步加深。各民族、国家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互相交流，同时又互相竞争，以此来决定自己在世界舞台中的地位，胜者为雄，败者为奴。15至17世纪，是世界历史开始新的伟大转折时期，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时西欧国家、通过海上的探险活动，打开了东西方海上通途，扩大了他们的眼界，特别是扩大商人开拓市场、广求富源的眼界。荷、英、法等国在政府支持下，商品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国内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制度的束缚，在海外用各种手段来开拓殖民事业，夺取黄金、白银、原料、市场、劳动力（奴隶）等等，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出了资本主义最早的历史。这时期的中国则相反，封建统治者昧于世势，满足于自己的地大物博等近乎静止的条件，用陈旧的“天下”观念来对待正在急剧变化和发展的世界。他们以“天朝”自居，既不知各国正努力争富求强，更不知国与国以商战竞富逞强。尽管当时中国在各方面有良好的条件，他们却把这些条件当作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依恃，大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sup>⑥</sup>。这话使人深思，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落后的原因，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封建王朝的闭关自守和排外政策，早在14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明王朝建立后，借口国内政治事件和对外防止倭寇而厉行海禁，接着清王朝亦因郑成功据守台湾而厉行迁海，前后数百年内中外正常的通商往来遭到阻绝。然而“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sup>⑦</sup>，正常的商务之路不通，必然采取别的途径。或是一伙伙商人拉帮结夥，冒禁进行海上走私贸易，16、17世纪海上走私贸易集团和船只难计其数；或是远离故国，侨居海外，与当地和西方商人进行商业交往，到日本、南洋各地的华侨数以万计。无论是海上走私集团或海外侨商，其经济和武装力量都相当强大。他们在西南太平洋区域内足以与西来的殖民主义者抗衡，使中国的商品经济通过海外贸易而得到更大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可是，正当西欧各国政府支持海外活动之时，中国的海外活动却受到本国政府的打击，海上

走私贸易集团一个个被剪除。16世纪50年代王直集团之被剿灭,不仅现在看来是愚蠢的,即在当时也有人之为愤愤不平<sup>⑤</sup>。至于海外华侨,不仅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的斗争未得到本国政府的援助,而且还受到它的压制。1593年吕宋华侨潘和五、郭惟太反对佛郎机(西班牙)的斗争取得了胜利,郭惟太回国却受到惩办,潘和五被迫流落安南<sup>⑥</sup>。在这各国相互竞争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封建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态度是如此顽梗,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演成国家落后挨打的历史悲剧。

对于当时各国通商的形势,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有所了解的,认识到开展国际贸易是大势所趋,对本国也不无利益。嘉清年间唐枢说:“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sup>⑦</sup>万历年间张瀚也说:“若夫东南诸夷利我中国之货,犹中国利级夷人之货,以所有易所无,即中国交易之意也”。“海市所易,皆民间财货,无妨国升”,“海市有利而无害,主计者何不思也”<sup>⑧</sup>。这些话颇有见识。他们对政府的海禁政策表示愤慨。沈德符(1578—1642)说:“我朝书生辈(实际指朝廷)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是不明事理的无知之谈<sup>⑨</sup>。万历时,许孚远认为,因防倭寇而实行海禁,“不几于因噎而废食”,迫使中国海商“转而为寇”,更不能达到防倭的目的,只会“并弃诸国”;若开放海禁,“使处置得宜,制御有术,虽番夷不足虑”,且“市通则寇转而为商”<sup>⑩</sup>。这些切中时弊之言,封建王朝统治者是完全听不进去的。他们固守重农抑商的传统,以闭关禁海为得策。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兵舰和大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华民族终于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蒙受了整整一百年的耻辱与灾难。

#### 注 释:

① 《封建主义的危机》,见《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5期、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

③ 这里借用(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用语,见该书第52页。

④ 《政治经济学辞典》(上),第606页。

⑤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1、318、360—361页。

⑥⑦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7、694页。马克思的话是就19世纪法国情况而言,完全适用于19世纪以前的中国。

⑧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⑨ (宋)董煟:《救荒活命书》卷三,引范镇论救荒(《墨海金壶·史部·荒政丛书》)。范镇字景仁(1028—1089),四川成都人,北宋时进士,著有《范蜀公集》、《东斋记事》。

⑩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9页。

⑪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5页。

⑫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82页。

⑬ 《中国纪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⑭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361页。清王朝并非亡于农民起义,而是亡于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

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98页。

⑯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七七、二〇八。

⑰⑱⑲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版,第371、377、378页。

⑲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7页。

⑳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8页。

㉑ L·S·Staverianos:《The World Since 1500》(第2版),美国新泽西版,第168页。

②③ (美)德克·卜德:《中国物品传入西方分考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②④ 《明会典》卷三五。

②⑤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王士性《广志绎》卷三。

②⑥ 施显卿:《奇闻数记》(《纪录汇编》卷二一三)。

②⑦ (康熙)《吴江县志》卷一七,(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引《桐乡县志》。

②⑧ 张瀚:《松窗梦语》卷六。

②⑨ (英)威廉·S·阿特书尔:《1530—1650年间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载英国《过去与现在》杂志1982年5月号。每公斤折合中国旧制为32两,345000公斤为11040000两。

③⑩ 《十五至十七世纪中国商品经济对农本经济的侵蚀》,载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⑪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〇。

③⑫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

③⑬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〇一。

③⑭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五及陈懋仁《泉南杂志》。

③⑮ 花村看花行侍者《花村谈往》卷一。

③⑯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175页。

③⑰ 《习学记言》(黄宗羲《宋元学案·水心学案》)

③⑱ 《陈亮集》卷十一,“四弊”。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③⑲ 《赠水部周汉浦榷浚还朝序》(《张太兵文集》卷八)。

④①④②③④ 《松窗梦语》卷四,卷一,卷四。

④①④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六。

④③ 《实政录》卷一。

④④ 《元史》卷九四。

④⑤ 《漫录评正》卷一,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265页。

④⑦ 参看刘炎《明末城市经济发展下的初期市民运动》(《历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该文未列入万历二十七年(1599)山西清源县王朝佐领导的暴动。

④⑧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九。

④⑨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六〇、三六一、《苏州府志》卷一四七。

④⑩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七二。

④⑪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九三。

④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④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④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

④⑮ 参看《王直与明王朝的海禁政策》,载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

④⑯ 《明史》卷三二三。

④⑰ 《复胡梅林论处王直》(《明经世文编》卷二七〇)。

④⑱ 《万历野获编》卷一二,“户部·海上市舶司”。

④⑲ 《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卷四〇〇)。